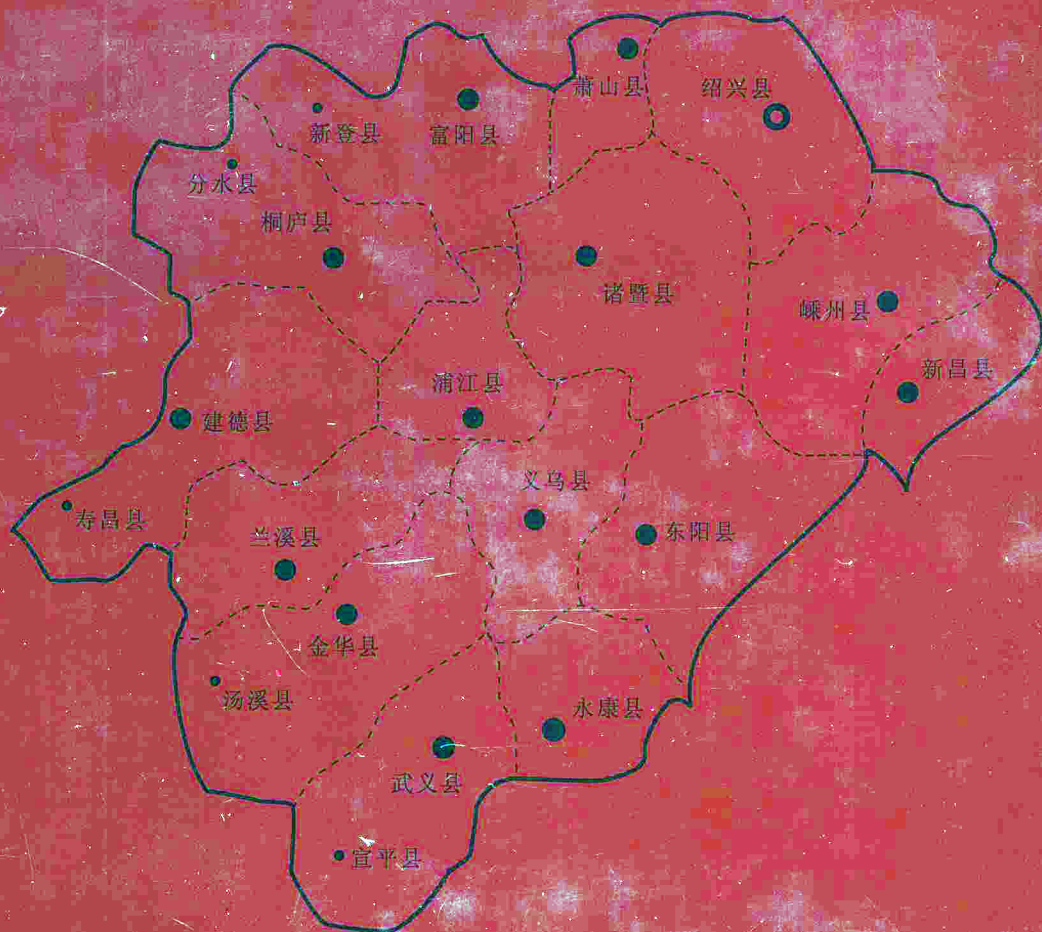


金萧地区 抗日战争史长编

浙江省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杨长岳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金萧地区 抗日战争史长编

(上 卷)

浙江省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杨长岳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 / 杨长岳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208-912-9

I. 金… II. 杨… III. 抗日战争—史料—浙江省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081 号

书 名: 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

出 版 人: 董 伟

主 编: 杨长岳

责任编辑: 杨忠诚 田玉香

封面设计: 书 道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天鸿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600 千字

印 张: 162.75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8-912-9

定 价: 580.00 元(上中下卷)

序一

为历史树一块碑

在 2005 年我国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诸暨市新四军研究会编写了《诸暨抗日战争史》,立足一隅,用翔实、全面的史实,反映出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地方史编撰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出版之后,广受各界好评。时隔三年,诸暨市新四军研究会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扩大战果,推出这本《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先睹为快之后,不禁再次抚掌叫好。

金萧地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区域,有着杰出的历史文化和悠久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涌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正在渐渐淡忘这一片土地曾经拥有过的一段光辉岁月。从滔滔江水到莽莽山峦,江山未变,然而人们在遗忘中几乎听不见历史隐藏在江山之后的叹息。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尤其是一段光辉历史。我国现代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界的弱项所在,何况区区地方史,更为专注于宏大叙事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所无暇问津。这种局面在各地的普遍出现,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诸暨市新四军研究会力挽颓势,勇挑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的编撰重担,为地方史志研究填补一项空白,其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无疑是深远而巨大的。

书中采用全新视角,实事求是观照史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做法,十分值得称道。正如我们已经一致认同的,抗日战争是全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当时的各党派、各阶层都作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和牺牲。但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由于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固有思潮的影响,想当然地写史又不尊重历史,未能如实记录、反映、再现历史,造成历史研究上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我们正在纠正之中,应该说《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对此作了很好的尝试。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名著《全球通史》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问题,探求新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是一本与时俱进的书。

我还要重申这一个观点:编写抗日战争史,一不是为了创造或加深民族仇恨,二不是为了翻过去的陈年老帐,历史不应该被隐瞒,也不能被漂白,而是为了让世人和后代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前辈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就像一



块碑,树在茫茫征途中,让我们看清楚过去的路和未来的路。希望有越来越多像这样为历史而树的碑,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荣光,使后来人的心中更有方向。

夏征农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

(作者曾为南昌起义老战士、新四军民运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辞海》主编)

序二

牢记历史 不忘屈辱

为了灭亡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从近代以来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侵略。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可是自从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政府一直拒绝像德国那样认真忏悔，反而不断地制造事端，歪曲历史真相，否认其侵略罪行。而在中国，也有很多人早已忘记了这场关系到民族危亡的战争，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忘记了无数先烈艰苦卓绝、奋死抗战的悲壮历史。一位著名的日本企业家曾说：“我们不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不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买我们的产品”。——这一句足以让中国人从头凉到脚的话，正是对许多中国人善于健忘历史的讽刺。

为了教育与警示中国人民，特别是新生代中国人牢记历史、不忘屈辱和维护和平，杨长岳先生在主编《诸暨抗日战争史》之后，又主编了这部《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由于杨先生看过我写的有关抗日战争史的文章，赞成我的很多观点，因此他们在撰写过程中曾同我联系，希望我能为此书作序。由于我最近身体不好，不能看他们的全部书稿，本没有资格来作序言。但我被杨先生的精神深深感动，就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权作此书的序言吧。

首先，杨先生对抗战史研究的热忱和勤耕不辍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多年来，他在积极做好地方文物、历史调查研究的同时，还一直在做金萧地区抗战史的查证、取证和护证工作，并撰写了多篇研究、介绍这些文物、史料的文章。他已经是近80岁的高龄，而且不是专业的研究工作者，但他始终孜孜不倦，到处辛苦地搜集资料。为此，他和两位青年人走遍20个市县，查阅了众多的档案资料，并大量利用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以及台湾、海外已发表的资料。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他们认真地撰写书稿，经过4年的努力，这部洋洋300余万字的巨著终于完成了。这充分体现了杨先生的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研究教学工作者学习。

其次，这部书稿内容广泛，资料翔实，全面地反映了金萧地区抗战的历史。全书共分十一篇，分别论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金萧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团体，1940—1942年发生在金萧地区的三次重要战役，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和民众的抗战，日军的滔天罪行，日军的细菌战，日伪的血腥统治，金萧地区的抗日名人及



抗日烈士,日本的投降及金萧地区对汉奸的惩处等方面的内容。在每一部分中,不仅有总体的论述,还附有相关的历史资料。像这样内容详尽的一个地区的抗日战争史,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再次,评价客观公允。我以前曾指出过一些抗日战争史著作存在的偏向:“在内容上不是集中写日本如何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哪些严重破坏和中国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是用大量篇幅来写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或共产党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错误,使人觉得抗日战争好像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两国三方’之间的战争”。认为“写抗战史,不能只从一个党的角度,不能仍然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这部书稿就没有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是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的,集中反映了民族的矛盾和全民族的抗战。书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地方武装的抗战、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以大量的原始资料记录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的抗战。对于为抗战而牺牲的各界人士,特别是著名的抗日人士,书稿也不分党派作了简述和肯定。这样,就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再现了金萧地区的抗战历史。

这本书的缺陷,是内容的编排还不尽合理,有些方面的内容还不够全面,详略还不够得当。尽管书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此书仍不失为近年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本好书、一个可喜的成果。因此,我很愿意将它推荐给史学界的朋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一读这本书,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写出这样的书。只有将各个地区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清楚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史才能研究得更清楚,在此基础上写出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内容才能更全面、更充实、更丰富、更有说服力。

祝建康
2009.5.17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序三

众人拾柴火焰高

2005年9月3日,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到诸暨参加了《诸暨抗日战争史》的首发式,初看到这部120万字、大16开、500余页的史著,颇有点吃惊,似乎不能相信系出自一个县级市的群团研究组织。等仔细看完全书,才恍然有所悟:在这片辉映着抗战业绩的土地上,有这群传承了抗战精神的编著者,有这么多领导、前辈、专家、学者以及各级部门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大手笔的问世,也应在情理之中。

史称“八年抗战”,其实应从1931年算起,到1945年结束,中日战争绵延14年。要描述这14年的伟大抗战是一种极复杂、极浩繁的工作。全景式地描述这场战争,对每一个研究抗战的人来说都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史学界很难寻一部描述与分析皆佳,能得到各方一致首肯的抗战全史。那么,针对这一段伟大历史的地方性研究或者说区域性研究,就显得格外珍贵。因为一、这种研究方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中国史学界“重古代轻现代”的长期流弊;二、这种研究模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障碍,直抵“历史的真实”;三、这种研究成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将来的“抗战全史”奠定了史料方面的基石。

循着《诸暨抗日战争史》的方向前行,诸暨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尺竿头,又上了一层,用三年时间,再次编撰完成了《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皇皇三百余万言,工程不可谓不大,成果不可谓不丰。“金萧地区”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域,留下了它的特定内涵。它的苦难与抗争,它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造就的巨大辉煌。那段难忘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发掘、整理、传承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多年了,许多当时人已经离开了人世,不少可歌可泣、英勇壮烈的抗日故事,被湮没在时间流逝的长河里。所以,这部巨著也带有抢救史料的意义。

1931年“九一八”之后,中国承受了来自日本现代化战争机器的疯狂攻击,风雨飘摇中,显得孤独而无助。生死存亡之际,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为御外侮,慷慨赴难。今天,这一段历史把我们牵引到一起,一起关注与这一段历史有关的一部书,一起感受这部书带来的历史深处的回响和心灵深处的共鸣。



众志成城,中国人可以打败百倍强于我们的侵略者。众人拾柴,我们可以燃起召唤民族精神不屈而向上的熊熊火焰。

遵嘱为序,临纸欣然。

葛殊樾
戊子年初冬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原副政委,中将)

前言

所谓的“金萧地区”，它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名称，该地区泛指浙江中部金华至萧山的浙赣铁路两侧、富阳至兰溪的钱塘江两岸，以及会稽山南北。位于浙江中部。全境约 20 县，今分别属杭州、绍兴、金华三市管辖。

“七七”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就侵占了京沪杭一线，金萧地区军民扼守钱江天堑，御敌于钱江北岸长达 26 个月之久；同时以永康、金华为中心，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日军入侵本地区期间，广大军民更进行了奋勇抗击，以凶残著称的日军第 15 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就是被我国军第二十一军一四六师在本地区打死的。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海外派遣军被打死在海外战场上的第一名中将。本地区沦陷后，不愿做亡国奴的金萧军民，他们不屈不挠继续战斗，先后组织了大小、各式各样的上百支武装游击队，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共产党领导的“金萧游击支队”，曾在区域内建立 6 块大小不等的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近 5000 平方公里，人口 110 余万。游击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唱响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凯歌。

“金萧地区”的所在地域不但跨县，而且跨市，它是在抗日战争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军事状态下凝聚起来的一块特殊的土地。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它的名称也就不复存在。

但是，这段历史是非常辉煌的，它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进程中，理应占有一定的位置。然而，也正由于它那“特殊”的“生存”态势，70 年过去了，这段悲壮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无人涉及。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段历史不是被湮没，就会被割裂的现状；眼看着那场人间浩劫离我们越来越远，经过那场灾难的幸存者越来越少，就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作为历史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把那段历史写出来。通过存史去育人、资政。首先，从 1940—1942 年日军对本地区的三次入侵，诸暨几乎都是最重要的战场，金戈铁马、硝烟刀光依然还存活在许多耄耋老人深埋的记忆里，通过他们的叙说，我们能抢救出许多真实的史料。同时，诸暨这块土地和“金萧”这个名字的诞生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金萧支队是在诸暨成立的，金萧支队的第一支小部队也是在诸暨建成的，支队的的第一任政委也是诸暨人，6 块抗日根据地诸暨有 3 块在其中。诸暨一直是



金萧支队活动的中心。我们是一个县级的民间社团,是一群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过来的年迈老者,以“新四军历史研究”作为自身的研究中心,新四军研究者而不去研究抗日战争,何说“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我们决定把“金萧抗日”的这段历史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去研究,把分散在各地、各部门、各角落、各单位的史料收集起来,汇编成册,传承后代。考虑到我们的水平有限,无法把史实和表象进行总结归纳成结论或总结出鲜明的观点,故定位为“长编”。何谓长编?“在写定著作之前搜集有关材料并整理编排而成的稿本”。^①

上面这段话,试图告诉读者的是两点:一是何谓“金萧地区”,二是在我们编写这本书时的思考和定位。

二

对现在的中青年人来说,“抗战”已经是遥远的历史。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有一部分年轻人对我们经常要去“挖历史的伤疤”,很不已为然。认为已经翻过去的历史,用不着继续追寻。这些人有的出于好心,有的出于糊涂。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时间上离我们越来越远,可是它在许多中国人心里的分量却显得越来越沉重。教科书事件、参拜神社事件、索赔官司的败诉,日本人一连串的表现使中国人越来越不满。我们的不满是因为有了与德国人的对比而更加强烈。都一样是大战的罪责国,这边的首相在参拜战犯的神位,那边的总理在被害者的纪念碑前下跪赎罪,这太令受害的中国民众觉得无法忍受了。愤慨之余,许多人也会问,日德两国的首脑们如何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表现呢?我们的答案还不少。文化史家们从文化根源上找到了回答,德国民族具有的是一种罪责文化,而日本民族具有的是一种耻感文化,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责任的反映就很不相同;国际政治学家们作出了国际政治背景的回答,这一切都是美国的战后政策造成的。因为冷战的需要,美国没有在日本彻底地清算战犯,结果日本人就没有了什么犯罪感。

这些解释或许都有其道理,但似乎都间接了点,都像是缺少了点什么。我们首先应该观察一下原罪责国对战争的负罪感是怎样形成的。如果德国和日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话,我们应该先来看看德国人是怎么会有沉重的负罪感的?他们是为什么会感到有罪的?

德国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使德国人低下负疚的头颅的不是那些越过边境的装甲师团而是战争中犹太人的遭遇。今天,德国人感到他们在战争中最主要的罪责,他们最根本的罪孽,是集中营中的数百万犹太人的死亡。德国为铭记自己在大战中犯下的罪恶而在柏林市中心建立的纪念馆正是献给犹太人的。所有德国人,甚至所有的西方人,在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时,脑子里立刻想到的不是倒在战场上的士兵

^①《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第139页。

和死于轰炸中的平民,直接地冲击着他们良心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那些骷髅般的犹太囚犯的身影。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成了德国人必须直面、必须回答的问题。

犹太人的牺牲虽达六百万之巨,但是在德意日法西斯导致的数以千万计的全部死亡人数中也只是一个部分。为什么这部分人的死亡会如此地撼动人心呢?事实上,单纯的死亡人数并不足以令人动容,需要有更深入的历史工作,来赋予这个史实今天它所具有的意义。在大战刚结束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什么特别的注意。以清算纳粹德国战争罪行为目的的纽伦堡审判,并没有把屠杀犹太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控提出来,在那场举世瞩目的审判中,纳粹头目是作为战犯,而不是作为种族灭绝犯被定罪的,他们的主要罪责是发动侵略战争。甚至大战后立国的犹太人的祖国以色列,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怎么想到他们那些死于希特勒集中营的同胞,那时候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甚至羞于谈论这几百万不幸的死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可怜的同胞根本就不应该留在欧洲束手待毙,他们早就应该移民巴勒斯坦为民族家园斗争了。

这一切在1961年都变了。经过多年的追踪,神通广大的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了潜逃的前纳粹中校艾赫曼,并把他押回了以色列。随后,在以色列当时的总理本·古里安的精心策划下,耶路撒冷举行了一场轰动世界的审判。就是这场大审判,把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推到了世人的眼前。这个原先默默无闻的艾赫曼中校,正是党卫军里具体负责运送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的官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按照西方司法严谨而细致的程序,大量的证人以亲身的经历作见证,把种族灭绝的恐怖历史点点滴滴生动鲜明地复述出来了。句句证词都是经得起核对的法律证据,句句证词又都是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做出的。这场审判最终给艾赫曼判了什么刑已经无关紧要了,审判中证人们所做的长达二千二百页的证词,改变了世人对十多年前那场战争的了解。对犹太民族犯下的大屠杀罪行,渐渐地取代了纳粹的其他战争罪行,而成为人们对战争苦难的最突出的回忆,由此而产生了德国民众深深的负罪感,随后才有勃兰特总理在华沙那著名的一跪,才有西方影视界那些描写犹太难民命运的巨构大作,才有今天柏林市中心的为犹太受难者而建立的纪念馆。

当然,对艾赫曼的审判,并不是犹太民族为讨得历史正义所做的惟一的事。怀着虔诚的历史责任感,犹太裔和许多非犹太裔的欧美历史学家们,在战后一直努力挖掘和搜集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证。据统计,西方至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史学专著有几千部之多,发表的论文的数量竟达十余万篇,涉及的语言有一百余种。历史学家们以惊人的努力,把这段可怕历史的所有细节都挖掘出来了,使大屠杀的牺牲者不至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历史的长夜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里面密密麻麻地全是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单。这显然是长年艰苦调查的结果,这种历史调查工作或许是那些热衷于大叙事的学者所不屑为,但是它们所具有的无可辩驳的力量,也是空洞演讲所无法比拟的。曾有历史学家指着这些名单对散布修正史论的人说,你们说毒气室和焚尸炉都没有存在过,那么请告诉我们,名单上的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今天,对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份来历清楚无可辩驳的牺牲者名单呢?我们应该是能有的,只是在还可以做这样的调查时,在证人和证据都在时,似乎没人对此感兴趣。不管是什么原因,翻开建国以来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类学术刊物的目录,连篇累牍的都是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等等的长篇议论,而很少看到关于日军屠杀平民的专题文章。建国后历史学一直是显学,历史著作出版不算少,却没有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对日军罪行的实证研究。历史学家们忙着讨论他们的重大题材。然后,讨论的前提一消失,历史学的范式一变,几代人的这些史学论述全成了无意义的废话;现在到了和日本的右翼较量时,我们的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令人沮丧的单薄,结果我们对日军的指控落到了被人称为“感情回忆”的地步。而对方在这些年里倒没闲着,他们围绕着“原子弹爆炸”做出了一篇大文章,从细致的史实研究到动人的文艺创作,加上各种公共纪念活动,“牺牲者”的惨状深深地刻入了人们的意识之中去了,自己罪孽的过去当然就被冲淡甚至湮没了。

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是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可是我们并没有去为这场战争及时写下那段历史,为让无辜被害的千百万死难者能安息,最有效的恐怕是做信史实录的工作。但是,现在是否还来得及做呢?更要紧的是,我们是否有像那些犹太史学家们那样具有深重民族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呢?

历史学家的坚实工作是解决战争罪责问题的基础,但是其他领域里的话语也一样的重要。在西方,举其要者,就有阿伦特在政治学层面上探究纳粹大屠杀根源的皇皇巨著,有阿多诺在哲学上的反思。阿多诺把纳粹大屠杀定义为“绝对的恶”,他的“在奥斯威辛后没有诗歌”的警言震人肺腑。可在我们这儿呢,论起日本侵略时所用的“坏事能变成好事”的玄妙辩证法真让人不知所措。还有,对于大众的意识来说,重磅学术著作的影响力远不及催人泪下的艺术作品。但在这方面我们的艺术家的作为与西方的同行也大不一样。获奥斯卡大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其实只是西方几十年来创作的无以计数的直接描写犹太平民被残杀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一部。当然,我们在那些年里描写抗日的作品当然也不能算少,可是关于日军大屠杀的场景是不能写不能画不能拍的,因为“渲染战争恐怖”是犯忌的,不仅通不过审查,作者也会倒霉。所以在我们的银屏上看到的多是我英雄的八路军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镜头,被害同胞的泪水都只是很有节制地稍微流一下。古人云“哀兵必胜”,我们在与日本右翼的历史之争中,恐怕自己放弃了哀兵的优势。回看一下欧陆的大战受害者和他们的后裔的工作和成果,看来我们在与日本右翼政客论理时先得问一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事。^①

这就是本书的编写动机。

^①褚孝泉:《写成历史的罪责》。

三

周恩来曾把历史称作“民族的记忆”，认为“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与他的观点有惊人相似之处的是基辛格，他强调“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个国家仅有的经验，也是他们惟一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他们的话都说明，不忘记历史，用正确的观点看待历史，对于今天是多么的重要。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从“九一八”至武汉失守，又是中国抗战最为复杂、最为艰难、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嚣张、绥靖逆流甚嚣尘上的时期。这一时期，全世界只有古老贫弱的中国在孤独而顽强地抗击着法西斯日军的侵略。每想到此，我们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虚弱的老者，艰难而无助地背负着世界正义和公道的形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是何等的悬殊：日本工业产值为 60 亿美元，中国为 16 亿美元；日本年产钢 580 万吨，弹药约 50 万吨，中国年产钢 4 万吨、弹药几千吨，在惟一能生产重武器的东北沦陷后，中国的武器几乎全靠进口；国军一线兵力尚能半数配备枪支，而八路军刚走上抗日前线时，3 万多部队只有 1 万多支枪，每支枪平均仅 30 发子弹，还有些战士扛着长矛……

——中国靠的是精神、气节和意志。

中国苦苦支撑，抗战 14 年，从未间断。纳粹德国在一个月内占领了丹麦、挪威、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国，号称拥有“欧洲最大陆军”的法国，也仅仅抵抗了一个星期便宣告投降。而中国，一个刚从军阀混战、满目疮痍连“表面”也尚欠统一的弱国，坚持了 14 年。并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反法西斯同盟的众多成员共同抗击德意法西斯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几乎是在独自抵抗着武装到牙齿的日本。

世界史学界有些人总是极力贬低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原因各异。我们认为，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长期以来，我们是如何来书写我们的抗战史的呢？

下面这段话，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先生说的：“在现有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大部分就是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来写的。在这样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第一，在内容上不是集中写日本如何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哪些严重破坏和中国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是用大量篇幅来写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或共产党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错误，使人觉得抗日战争好像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两国三方’之间的战争；第二，对于中国的抗战，主要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的抗战，则写得



比较简略,甚至有意地贬低和否定,致使他们的许多重要抗战事迹没有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这就使人觉得不够全面和客观。

“有的学者还为这种做法寻找政治根据,认为中国共产党写的抗日战争史,当然应该以反映自己领导的抗战为主,主要歌颂自己的功绩。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那就必须写出国民党的错误。国民党写的抗日战争史也没有写我们的功绩,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做宣传呢?这实际上把自己降到了国民党的水平。他们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在同国民党作斗争的非法政党或在野党,而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体中华民族利益的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就不能只从一个党的角度,不能仍然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

“从抗日战争本身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民族战争。既然是民族战争、对外战争,就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站在国家对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写出的抗日战争史,就不应该只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的抗战,而应该全面反映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对于国共两党和两个战场,就不应该突出它们之间的磨擦和斗争,而应集中反映它们之间的团结抗战,在比例上也不能倚轻倚重,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应该更大一些。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国共两党虽然都是坚持抗战的,但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主张是不同的,共产党的主张确实比国民党高明,国民党的主张确实存在很多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此消彼长,并导致了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但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自己家里的事情,在抗日战争史里边不应写得过多,而应集中反映各个民族、阶级、阶层、党派、团体英勇抗战的事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内部的差别和斗争无论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来侵略才是最重要的。”

胡乔木在谈到怎么写中共党史的时候曾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①写中共党史都要如此,写抗日战争史就更不能有宗派观念,眼睛只看着自己。

总之,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尽快地从中共党史的研究模式中跳出来,从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真正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场民族战争来写,使各方面的人都觉得我们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客观的、科学的,是能够接受

^①《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的。杨尚昆说得更具体：“历史，只讲自己只讲好，这不是历史。”

我们自己都不能正确地书写那段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怎能苛求外国学者必须“公道、正义和正确”呢？故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客观和公正，力求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中日关系的现状，它迫使我们把中日关系的过去如实地告知我们的后代。在当前这个对历史越来越麻木和遗忘的年代，更有这个必要。

日本的主流社会认为侵华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对这场战争及其根源，没有在精神层面上经过一场彻底的、脱胎换骨式的梳理和反思，所以日本人到现在为止都无法说清“谁对战争负责”。

战后，日本从战败国发展成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实体，经济上的自信心在急剧增强，年轻人和政治家都成长起来，就觉得过去了的战争就过去了，不要再去追求了。日本上一代留下的历史观本来就存在着巨大的错误乃至模糊，大部分日本人因而缺乏对侵略战争真相的思辨能力。要去追究细节，问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到底错在哪里？日本在模糊的基础上崛起是存在风险的。一个民族要正视自己，需要抛弃感情色彩。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在美国的扶持下，不但毫发无损，还继续控制着政权。现在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会员约占国会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日本政界具有不小的影响力。据了解，该恳谈会多数成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也否认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上存在强制性。水岛悟导演的电影《南京的真实》中说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是零。自民党“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委员会”会长中山成彬等人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认为中国在搞“反日宣传”，歪曲历史，损坏了日本“名誉”。

中日之间除了历史，更有现实及未来问题。历史问题太复杂。现实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两强并立，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局面。未来问题是两强如何相处，再加上有台湾、钓鱼岛、东海能源以及两国民族心态等问题。

现在中日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中国在崛起，日本也很强大，两国民族情绪又很复杂，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厘清。另外，美国既不希望中日开战，也不希望东亚两强联手，这里需要的是政治家的智慧。

一本书，一本历史书，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但是一本书写好了，也可能给那些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参照。

在明治维新后的 70 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 14 次侵略战争，其中 10 次是对华战争。历史学家郭廷以曾说：“两千年来，中国赐予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投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伤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给予的最多最巨”。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让历史不要重演；研究暴行是为了避免暴行，让和平永驻。

我们赞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遗言：“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和平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仇恨导向战争，宽恕走向和平。宽恕不会改变过去，却能放大未来。对话、妥协、合作、多赢、和缓、和平，让和平永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更是世代代